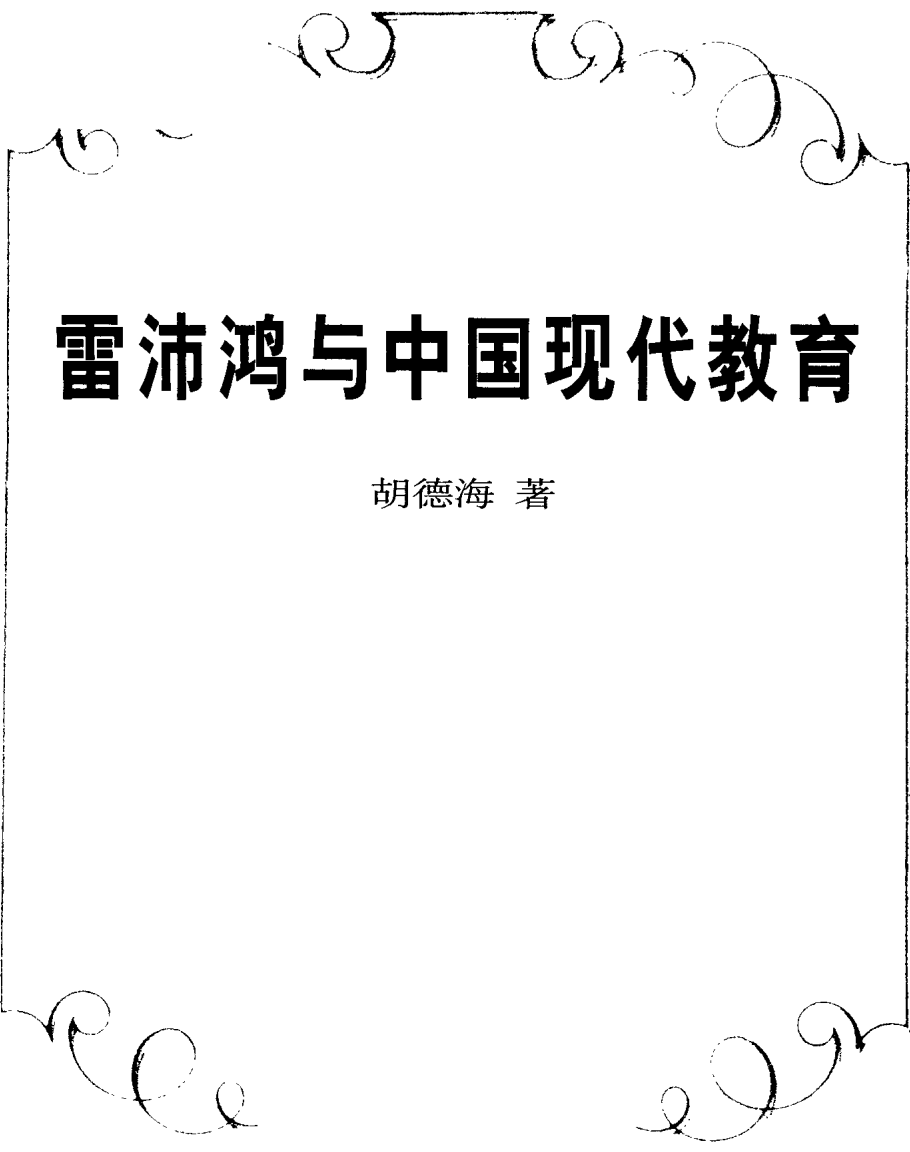


胡德海 著

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

甘肃教育出版社



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

胡德海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胡德海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1

ISBN 7 - 5423 - 1038 - 0

I. 雷... II. 胡... III. ①雷沛鸿 - 生平事迹
②雷沛鸿 - 教育思想 - 研究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834 号

责任编辑: 朱富明

封面设计: 吴 祯

责任校对: 曹小强

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

胡德海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0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5 字数 180 千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 - 5423 - 1038 - 0/G·798 定价: 18.00 元

代 前 言

——论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和雷沛鸿在中国 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及其基本特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

什么叫教育家？如果我们可以把教育学家定义为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学领域成一家之言的人，那么所谓教育家主要应该指那些在人类教育活动或教育事业中站在最前面，确实推动了社会文化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即在实践和理论上卓有成就和贡献的人。

和任何人一样，教育家也孕育、生长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天地里，他们也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产儿，他们既是人类

文化文明丰硕的收获者和拥有者，尤其是人类文化文明最辛勤的耕耘者和播种者。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们正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华文化文明最有力的推动者。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延续、存在和发展，最清晰地凝聚着历史上诸多教育家的丰功伟绩，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卓越的才能与智慧。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文明也最生动地体现在中国历史上诸多教育家的身上。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如果从中华民族文化文明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情况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时期的教育家，这就是说，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存在着三类或三批不同特点和类型的教育家，这便是上古时期的一类或一批，古代时期的一类或一批，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类或一批。

（一）中国上古时期的教育家

上古或称远古，也就是史家所说的史前期，即指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国在文明史以前的原始时代，即有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出现和存在，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历代人民不仅为此津津乐道，交口赞颂，而且从来引以为民族的骄傲。他们即是人们所熟知的留存在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女娲、黄帝、尧、舜等人。

上古时期，离我们今天实在太久远了，加之没有文字记载可作参证，这样，后人对那个历史时期的存在情况和部落氏族首领人物的故事的了解，就只能靠代代相继的历史传说。

例如，关于有巢氏，历史传说告诉我们：“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能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韩非子·五蠹》）

关于燧人氏，历史传说告诉我们：“上古之世，民食果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关于神农氏，历史传说告诉我们：“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议》）“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形势》）“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当世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之世，公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卷》）。

关于伏羲氏，历史传说告诉我们：他“教民佃渔畜牧，养牺牲以充庖厨。”（《补史记·三皇纪》）“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百物之情。”（《商君书·画卷》）

关于黄帝，历史传说告诉我们：“黄帝作杵臼”，“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易·系辞下》）“黄帝作舟楫”，“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

为通，致远以利天下”。（《易·系辞下》）

对于上述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黄帝等传说中的人物，人们可能会说，那是些著名的原始社会部落的首领人物，却不一定要加之以教育家的头衔。对此，笔者则认为，这些人固然是原始社会的著名首领，但关于他们的诸多传说却更清楚地告诉人们，他们只有首先是杰出的教育者，才能成为公认的著名的部落首领。这也就是说，在这些人身上，第一位的身份并不是部落首领，而是教师、教育家，他们首先具有了教育家的气质和表现，才成为部落的首领人物。这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完全是社会文化生活要求所致，也是适应社会存在和发展客观需要的结果，他们是发展社会文化，推进社会生活的创造人才，同时也是中国史前时期最典型的教育家。

关于这个道理，二千多年前的墨子曾说过，在生民之初，无刑政之设，人各行其事而“交相非”，无下混乱而无政长，于是“天下之贤能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近世谭嗣同也指出过，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共举为君的条件是什么？首先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他们是时代文化的开拓者，推进者，是为人民生存和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的祖先不可能选他为君，为首领，后人不可能视之为圣人贤者，他们也不可能名垂千古。《礼记·祭法》告诉我们：“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

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可见，我们的祖先从来都是讲原则、讲公道的，从来都是以实事为重的，也是最为公正的。实至名归，名与位都要以事实表现为基础，无此基础条件者，或可以欺蒙当世于一时，而不能欺骗历史于久远。历史上真正受到人民崇拜并在死后可以配享历史祭祀的人，只能是那些或是法施于民，或是以死勤事，或是以劳定国，或是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即确实对社会对人民有实际贡献的人物。

上述这些上古时期的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的史前时期著名部落首领，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教育家。或许也有人会说，依靠历史传说得来的有关史前人物的情况靠得住吗？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在这里我们所要尊重的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一贯重视文化创造，重视教化的思想感情。关于史前人物的一些传说故事，那怕是由后人精心设计出来的，也值得我们尊重、珍视和赞叹，也足可用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知识，重教化的民族，足可用来说明中国人民具有一贯的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试想，历史上的“后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祖先描绘成罪恶滔天的恶棍或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而却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和造福后代的教育者的形象呢，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何况，人类社会既有文明史，也有其史前期，尽管人类的文明史和史前期的历史具有重大性质上的差异，而其文化的创造与传承，具有前后的联系性则是毫无疑义的。人类文明靠文字传承文化文明，而史前期靠记忆与传说传承人类文化成果，这文字与传说之间同样具有联系性，也

是自然而勿庸置疑的事。

在后人的眼里，上述中国史前期传说中的诸多人物，都已为社会为人民建立了真正称得上光彩夺目，足以震古烁今的历史功勋和具有积健为雄的非凡气概，永远值得人们膜拜敬仰，而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最具实际意义的社会和人民的公仆罢了。在这里，部落首领一词也是公仆一词的别称而已，而不可以等同于后来的那种高高在上可以为所欲为的统治者的。不论从部落首领还是从教师、教育家的角度看他们，他们都属于最平凡而又最勤奋最智慧的劳动者。他们是一批真正的社会教育家，也是一批以教育活动为历史和个人使命的社会活动家。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特点在此，作为教育家的共同特征也在此，这也正是历史上真正有作为的教育家的本质所在。

（二）中国古代时期的教育家

中国古代时期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批教育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自殷商。从此至 1840 年三四千年之久的文明古史时期，不仅有一批性质同类的教育家活跃在教育舞台上，而且在他们身上反映着中国古代教育实践状况和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教育思想。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教育家相比，第二批教育家不论在实践上和思想上都得了发展。特别由于教育家们教育思想的发展，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教育活动的认识 and 把握从此可以站在理性的高度，这就大大加强了对教育的反映控制能力和自觉自为程度，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教育事业也从此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春秋时期的孔子，一直是一位人们公认的伟大的教育家，地位最为崇高，影响也至为深远。他是公认的第一个具有较系统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但我们不能就认为在孔子之前，中国古代就没有可以称道的教育家了。事实上，孔子在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就在继承和发扬了在他以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积累起来的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将人类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古代中国，一旦脱离了蒙昧和野蛮，就知道着手教育事业的建设，而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早在《尚书·虞夏书》中就已见端倪，“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作为氏族首领舜的教育人事安排，也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而在《尚书·周书》中所反映的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则更具清晰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周代的周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政治家或政治教育家。在他身上，理想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思想、气质得到完美的结合和体现，并成为以后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光辉典范。不仅如此，他的政治和教育结合的思想还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批教育家们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所在。孔子的思想学说和周公的思想就有其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和周公以德治国的思想不仅内涵完全一致，而且应该说就是脱胎于周公思想的结果。所以周公成为孔子心目中最崇高的人物也是必然的事。

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儒墨在春秋时代曾并称显学，从墨子本人的言行来看，他无疑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但是，在孔子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儒家教育思想在其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到底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从孔子以后，历代儒家代表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儒家哲学也被公认为是教育家的哲学。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荀子，汉唐之际的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宋、元、明、清时代的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颜元等一批人，他们就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一批教育家。正是他们对中华古代文明历史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并且，也正是在这批教育家身上，十分明显地体现着中国古代教育和古代教育家所共同具有的民族特色。这便是：其一，中国古代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主要是一种道德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家也主要是道德教育家，他们以教人如何“做人”和“完善自我”为本。其二，中国古代教育家都本着积极入世的精神，把教育和社会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教人积极用世，教人自立、自强、自信、自尊；教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教育家都是一些胸怀化民成俗，建国君民之志而又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和社会思想巨子。清初学者唐甄曾说：“古之圣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学即其政，政即其学。”（《潜书·有为》）这确实抓住了古代教育家思想的核心。

（三）中国近现代时期的教育家

中国历史上第三批教育家出现在 1840 年以后至 1949 年以前这段中国近现代时期，这段历史虽然才一百多年时间，但面临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也必然会产生与此变化时代相适应的一批具有新特点的新教育家。

1840 年之前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汇合的潮流中，逐渐向现代文明转换。中国旧文明体系的核心，是其独特的伦理价值。由于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至此形成了一个世纪之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折中于“中体西用”的互补价值。但是，从总体上看，从 19 世纪中叶起，西学东渐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潮流。进入 20 世纪，中国教育在“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下面临彻底转轨改制的现实课题。中国教育面向世界，已成为中国从近代到现代这百年中中国教育历史的基本气候。中国历史上第三批教育家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出现的。不少著名教育家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意义也主要在适应时代潮流和实现社会与历史使命过程中得以表现和衡量。

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领域的诸多教育家，如果作一番分析和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们各具不同特点，不同性质和有不同的类别。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批教育家所从事的是近现代教育，而第二批教育家的事业属于古代教育范畴。近现代教育比起古代教育来，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特别在从古代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显得复杂多样。这样

便决定了同样作为教育家，不可能在此过程中扮演同一个角色，而必然各具不同的特色和使命。教育家的不同性质、类别、层次主要由此而来。

基于以上所述的思路，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教育家依据其不同的历史地位和实际所起的作用，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西学东渐起鼓动宣传作用的；第二类是教育转轨改制的具体实行者；第三类则是探索教育中国化民族化道路的教育事业改革家。其中第一类人物可以张之洞为代表。张之洞，人们都知道他是近代中国政治、工业、教育、学术等领域的一位重要而复杂的人物。综观他一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彼此消长的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历史。因此，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实有其重要地位。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从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见解，它作为清末的统治思想，影响了文化教育政策的修订，影响了学制，并促进了教学内容的改革和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张之洞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他的最基本的历史作用，是为新学、西学、现代教育思想和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移植和推行，首先亮起了绿灯，作了切实的引渡，即他为此起了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宣传鼓动，推波助澜，大喊大呼的作用。

在 20 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中，主要是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引进。中国社会的教育现实这时面临转轨改制历史课题具体落实的任务。具体的教育事务主要是兴办各

级各类从西方引进的学校及从事具体的教育事业。由于有此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于是就有各种教育人才，新式教育家应运而生，这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二类教育家。于是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唐文治等这时便成为著名的高等教育家，而林砺儒、俞子夷、陈鹤琴、黄炎培等人也就分别成为中学、小学、幼教和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家了。以上这些教育领域也正因为有这些教育家为之作出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使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存在和发展。

与此同时，当然也有姜琦、吴俊什、邱椿等教育学家的出现。他们大多是在大学任教的教授，一般较少参与教育事业的实际建设工作。

在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引进、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也伴随着教育事业中国化、民族化问题的探索和教育改革的历史任务。这是因为这时所推行的教育制度，虽属新学范畴，属于世界较先进的一种教育制度，但它到底是一种舶来品，并非中国本土所产，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实际需要。所以，20世纪的中国教育既有转轨改制的内容，也有以中国化、民族化为目标的教育探索和改革活动，于是在这个领域又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教育改革家，而其中可以陶行知和雷沛鸿为代表。

总的说，教育改革家的目光所及是在探索中华民族整个教育的出路，他们怀抱着经国济民之志，一般都是站在时代和社会的至高点上来思考教育问题的。但是综观陶行知和雷沛鸿这些教育家们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由于他们进行教育改革、教育实验活动范围有大小的

不同，也有教育视野宽窄的区别，他们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又各有所属。相对而言，陶行知应属中观领域的教育改革家，而雷沛鸿则属于视野更为宽广的宏观领域的教育改革家。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教育家为数众多，且有不同类别，分属不同层次，这在笔者看来，既是一种事实，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批教育家不同于第一、二批教育家的主要特点之一。而这又和当时的社会分工更趋复杂直接有关。

已故沈阳师院马秋帆教授曾在其《对雷沛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再认识》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曾多次给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近现代教育史课，我总觉得中国现代史这部分的问题最多。为了讲述方便，我把从五四运动至解放前夕的教育家分列为五大类。”可见，在马秋帆教授看来，对这个时期的教育家进行分类，也是必要的。只是以上所表述的与马教授的分类见解有所不同罢了。因为对近现代教育史上的教育家进行分层分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本文全部内容也同样只是对有关问题的一家之言而已，在这里提出的主旨是为了进行学术观点的交流。

人类的教育，作为教育现象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不断发展和进步而愈显得复杂和丰富的。自“五四”后的中国教育界，教育家的人数不仅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名目繁多的教育家称号，诸如医学教育家，农业教育家，军事教

育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戏剧教育家，语言教育家等等。显然，这是一批专业性更强的专家型教育家。各类专家型教育家的出现，是社会科学文化进一步分化、发展的结果，是符合社会人才发展状况和关系的基本规律的，它正可说明人类对早已存在的教育现象的认识和其本质的把握此时更趋于细化和深入，然而，一位美国学者曾经给“专家”一词下过这样的描述性定义：正如在很小很小的事情上知道得很多很多一样，他们在很大很大的事情上就有可能知道得很少很少。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由于专家型教育家大多长期工作和生活微观的教育领域，他们的教育视野和教育观念都不能不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局限和制约。而只能说他们大都是具有一技之长和拥有某种专业知识的行家里手或可称之为微观的教育家。而人类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到了20世纪以后这个历史阶段，任何国家都十分需要一批具有宏观头脑的教育战略家为之运筹设计、统一安排、科学管理。因而可以说，那些能从全局出发，视野开阔，可以统揽全局的宏观的教育家，此时是尤为需要和难得的。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理智就是那个存在者的视野。你看得多远，你的本质就扩展到多远。”这也说明，只有视野开阔，胸怀全局，站得高，看得远，才能有大智慧，大气魄，大格局。

在现当代世界，办大教育，就要有大智慧，大视野，大气魄，就首先要有卓越的教育思想家、战略家。就要有类似19世纪初期德国的费希特、洪堡这样的人才。

二、雷沛鸿教育思想的基本含义和雷沛鸿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雷沛鸿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十多年来，他已从广西走向全国。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已为中国教育界和教育学术界所一致确认和肯定，他的独特的教育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90年代整整10年中，教育理论界、学术界范围相当广泛的人们学习、探讨雷沛鸿的教育思想，既是对这位先贤的纪念，同时也是为了开掘祖国教育文化遗产，推进教育科学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

那么，什么叫雷沛鸿的教育思想呢？

在笔者看来，所谓雷沛鸿教育思想，乃是指雷沛鸿在其一生，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我国教育事业所探索、设计、构建、实践的具有大众化、中国化的民族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的总称。

在雷沛鸿一生的教育实践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教育的大众化方向和中国化思想。他一生所孜孜以求的，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这两个“化”的实现。实现教育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既是雷沛鸿教育思想的灵魂，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基石，同时也是他得以跻身民族的人民的教育家行列，无愧于著名教育改革家称号的根本条件。而雷沛鸿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不限于在理论上、思想上对教育大众化、中国化问题作过一些呼吁和阐述，以及作过一般性的努力，他曾不辞艰险，排除万难，既不盲目抄袭外国，也不做老文章，更不肯凭主观臆